

青銅禮樂器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青铜礼乐器



主编：杜迺松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青铜礼乐器

Bronze Ritual Vessel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主 编 杜迺松
编 委 白寅生
摄 影 赵 山

出 版 人 陈万雄 胡大卫
编辑统筹 张倩仪

编辑顾问 吴 空
责任编辑 段国强 徐昕宇 周祖贻
设 计 张婉仪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71 号
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窝箕湾耀兴道 3 号东汇广场 8 楼

制 版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6 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 (繁体版)
©200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简体版)
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

规 格 大16开 (216 × 286mm) 320 面
国际书号 ISBN 7-5323-8664-3/J·74

版权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区，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图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本版图书仅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Condition of sale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distributed in Mainland China only.

故宫博物院藏
PDG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特邀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襄	王 尧	李学勤
张政烺	金维诺	宿 白

总编委主任委员：郑欣淼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杜迺松	李 季	李文儒
李辉柄	余 辉	张忠培
邵长波	陈丽华	杨 新
杨伯达	单国强	郑珉中
郑欣淼	胡 锺	施安昌
耿宝昌	晋宏逵	徐邦达
徐启宪	聂崇正	萧燕翼

主 编： 李文儒 杨 新

编委办公室：

主 任： 徐启宪

成 员：	杜迺松	李辉柄	余 辉
	邵长波	陈丽华	单国强
	郑珉中	胡 锺	施安昌
	秦凤京	郭福祥	聂崇正

总摄影： 胡 锺



总序

杨新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占地72万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万件。

公元1406年，明代永乐皇帝朱棣下诏将北平升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旧宫的基址上，开始大规模营造新的宫殿。公元1420年宫殿落成，称紫禁城，正式迁都北京。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国统治，仍建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内。按古老的礼制，紫禁城内分前朝、后寝两大部分。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辅以文华、武英两殿。后寝包括乾清、交泰、坤宁三宫及东、西六宫等，总称内廷。明、清两代，从永乐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仪，共有24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这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1914年，北洋政府将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部分文物移来，在紫禁城内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1924年，溥仪被逐出内廷，紫禁城后半部分于1925年建成故宫博物院。

历代以来，皇帝们都自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他们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视作自己的财产。因此在宫廷内，不但汇集了从全国各地进贡来的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精品和奇珍异宝，而且也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匠师，创造新的文化艺术品。中间虽屡经改朝换代，宫廷中的收藏损失无法估计，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土辽阔，历史悠久，人民富于创造，文物散而复聚。清代继承明代宫廷遗产，到乾隆时期，宫廷中收藏之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度侵入北京，横烧劫掠，文物损失散佚殆不少。溥仪居内廷时，以赏赐、送礼等名义将文物盗出宫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1923年中正殿大火，清宫文物再次遭到严重损失。尽管如此，清宫的收藏仍然可观。在故宫博物院筹备建立时，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其所藏进行了清点，事竣后整理刊印出《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六编28

册，计有文物117万余件（套）。1947年底，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其文物同时亦归故宫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战火的毁灭，故宫博物院从大量的藏品中检选出器物、书画、图书、档案共计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运至上海和南京，后又辗转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文物复又运回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2972箱于1948年底至1949年被运往台湾，50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运返北京，尚有2211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于南京建造的库房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的体制有所变化，根据当时上级的有关指令，原宫廷中收藏图书中的一部分，被调拨到北京图书馆，而档案文献，则另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藏保管。

50至60年代，故宫博物院对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进行了清理核对，按新的观念，把过去划分“器物”和书画类的才被编入文物的范畴，凡属于清宫旧藏的，均给予“故”字编号，计有711338件，其中从过去未被登记的“物品”堆中发现1200余件。作为国家最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肩负有搜藏保护流散在社会上珍贵文物的责任。1949年以后，通过收购、调拨、交换和接受捐赠等渠道以丰富馆藏。凡属新入藏的，均给予“新”字编号，截至1994年底，计有222920件。

这近百万件文物，蕴藏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极其丰富的史料。其远自原始社会、商、周、秦、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历五代两宋、元、明，而至于清代和近世。历朝历代，均有佳品，从未有间断。其文物品类，一应俱全，有青铜、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书名画、印玺、漆器、珐琅、丝织刺绣、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皿、文房珍玩、钟表、珠翠首饰、家具以及其他历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可以说这是一座巨大的东方文化艺术宝库，不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艺术的历史发展，凝聚着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

开发这座宝库，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为社会提供了解和研究这一传统的可信史料，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去我院曾经通过编辑出版各种图书、画册、刊物，为提供这方面资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各科学术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种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故宫文物以一窥全豹的出版物，由于种种原因，尚未来得及进行。今天，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故宫。学者专家们，无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还是从事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也都希望从故宫的藏品中发掘资料，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因此，我们决定与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统地反映故宫文物收藏的大型图册。

要想无一遗漏将近百万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数十年内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考虑到社会需要的同时，不能不采取精选的办法，百里挑一，将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来，约有一万二千余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这需要八至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可以说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六十卷的体例，我们采取按文物分类的方法进行编排，但是不囿于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与宫廷历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文物，则采用特定主题的编辑方法。这部分是最具有宫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们所忽视，而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今天，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历史价值。另外，对某一类数量较多的文物，例如绘画和陶瓷，则采用每一卷或几卷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编排方法，以便于读者的需要和选购。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务是艰巨的。为此我们动员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内老一辈专家和聘请院外若干著名学者为顾问作指导，使这套大型图册的科学性、资料性和观赏性相结合得尽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务由中、青年人承担，其中的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因此当我们刚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时，诚恳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和建设性意见，使以后的各卷，能达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忠诚合作！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们进行这一事业的人们！

1995年8月30日于灯下





导言

杜迺松

体现商周政治制度的青铜礼乐器

中国青铜文明的产生，是古代中国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些留存至今的青铜器造型优美，纹饰富丽，铸造精巧，铭文典雅，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青铜器原属日常生活用器，其种类和形制多摹仿陶器等质地的器物，但商周社会却根据礼乐制度的需要制作了一批具有特殊意义的铜质器物，即“青铜礼乐器”。统治者为维护国家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以显示“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的等级差别，赋予上至天子、下至士等不同等级的贵族以不同的权力。

青铜礼乐器直接为礼乐制度服务，被贵族用以祭天祀祖、宴享宾朋、赏赐功臣、纪功颂德及用作随葬品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器种，成为国家政权和个人社会等级的典型代表器物。例如周朝的九个鼎是国家社稷的宝物，占有它意味着占有王权，九鼎是周朝王权的象征。古籍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也。”（《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规定了不同等级用不同数量的鼎，这种制度被称为“列鼎制度”。此外，乐钟的等级制度也很鲜明，所谓“宫悬、轩悬、判悬、特悬”，即天子使用乐钟时可四面排列，诸侯三面排列，大夫两面排列，士一面排列等等。

故宫博物院收藏青铜器约一万余件，是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自商周至明清，各个时期的藏品应有尽有，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完整的发展演变体系。从器物种类看，有商周时期的礼乐器，两汉时期的生活用器及宋以后的仿造器等等。这些藏品大部分为清宫旧藏，还有一部分是私人捐赠和考古发现品。本卷选取商代至战国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礼乐器一百八十九件（套），既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承前启后的夏代青铜器

青铜是指在铜中加入锡或铅，根据添加的数量和比例，使之降低熔点和增强硬度，其物理特性较之红铜有很大的优越性。中国在夏朝时进入青铜时代，至商、西周时达到高峰，春秋之后开始衰落。

关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世本》中有“蚩尤作兵”的记载，即蚩尤以铜器做兵器，但迄今尚未得到实物的证明。近年来在黄河流域的很多地区都发现了原始社会后期如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等青铜或红铜制品，或与冶铜有关的遗物和遗迹，因此这时期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当时的青铜加工方法有锻和铸，器物种类主要是小件的工具、兵器和装饰品，如锥、凿、刀、斧、指环和铜镜等等。其中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和甘肃永登连城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用单范铸成的两件青铜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表明至少在5000年前，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617号灰坑内发现了一件铜鬯残片^①，证明此时已能铸造青铜容器，其时间与夏代衔接。

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经测定时代约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时间正在记载的夏代纪年之内。二里头青铜制品中不仅有工具、武器、装饰品，而且还有容器和乐器，如铙、凿、锥、刀、鱼钩、镞、戈、戚以及爵等。

在铸造技术上，小件的实体工具和武器用简单的单扇范铸成，而铜爵、铜铃等空体器，制作比实体器复杂，通过对铜爵铸痕的观察，当时已采用多合范的制作方法了。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出现了镶嵌绿松石的铜器。二里头铜器，除少数为纯铜外，大部分为青铜器，表明这时能铸出含锡量较高的容器和工具，有些还采用铜、锡、铅三种元素的合金。

尽管夏代青铜制品的数量和种类还较少，且以小件制品为主，有的制品还很粗糙，但青铜空体器(尤其是爵等)的出现，反映了青铜器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发展。用绿松石镶嵌的铜器图案布置得协调匀称、富丽精美，武器锋锐坚硬，器表多素面，但一些器物开始出现简洁的乳钉纹、云纹和弦纹。二里头夏代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冶铸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铸造高峰的商代青铜器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从商汤立国至盘庚迁殷前为前期；盘庚迁殷至商亡为后期。

商代前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冈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已有较多的礼器和武器，能铸造大型方鼎和圆鼎，器物装饰性加强了，铭文已萌芽。这时期青铜器造型准确，器壁匀薄，最能反映其时冶铸水平的是出土了几件前所罕见的近百斤重的大方鼎。与二里头时期比较，这时青铜器的种类已大为丰富，食器有鼎、鬲、甗、簋，酒器有爵、斚、觚、盃、尊、盃、卣，水器有盘，武器和工具有戈、镞、钺、戟、凿、钺。

造型已不是简单地移植其他质料器物，而是依据青铜的质料和色泽特点进行创造。鼎、鬲、甗多深腹，圆形鼎作三锥形空足，双立耳外侧做成曲槽，一耳与一足相对应，另一耳在另两足之间。簋少见，一般深腹，无耳。爵、斚多平底(图66、69)，爵不束腰，双柱较短；有的斚腹作袋足状(图71)。觚体粗短，个别的觚口部带流。盃长颈，宽肩，腹下收，高圈足。盃作长体，三袋足，半圆形盖，上部有穹隆顶，顶的前部有筒状流(图94)。盘无耳。钺体呈长方形。戈援狭窄。纹饰简单、质朴，多无底纹的单层花纹，常见两夔纹上卷合成一兽面纹，上下是圆圈纹作边框。此外还有云雷纹、圆涡纹、弦纹、圆圈纹。方鼎左、右、下方有乳钉纹。铭文少见，有一些族徽式图案。

商代后期，冶铜、铸造更加专业化，青铜器制造达到了高峰，数量庞大，铸造精致，种类繁多，造型庄重，花纹细密，铭文典雅。以当时的国都安阳殷墟出土物为代表。殷墟青铜器早在宋代已有著录，近百年所出更为丰富，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即出于安阳武官村⁽²⁾，为商后期青铜器的代表作。该鼎为中国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是仅见的，反映出商后期青铜铸造的高度发展。

器类上出现了新品种。食器主要有盂、豆、匕等；商人善饮酒，因此酒器最发达，主要有壶、觥、角、觥、方彝，及各种鸟兽尊，如象尊、鸟尊、虎尊、猪尊、羊尊等；乐器有铙；兵器和工具有弓形器、兽头刀、胄、斧、铲、锯；车马器有害，等等。

形制上三足器多为柱足。鼎有圆形、方形、分裆等形式。蒸食器中如兽面纹大甗，作圆形，为鬲、甗合体，形体高大，浑厚凝重(图7)。簋常见为无耳或双耳，本卷所收乳钉纹三耳簋(图11)，器腹上有三耳，有别于常例，风格独特。宁豆(图12)，浅腹，短颈，豆在这时殊为少见。爵凸底，双柱加高(图67)，单柱爵也有发展。斚多作长圆腹或分裆，册方斚(图70)体呈方形，四足外侈，盖铸双鸟钮，庄重典雅，堪称稀世之珍。觚呈细长喇叭状，出现凸起的觚腰(图73)。壶多作长颈，鼓腹，颈上一对贯耳(图92)。卣有圆、方和筒形，有的方形卣在腹部四面各



有一长方形孔，两两相互穿透，称“十字孔方卣”（图81），别致精巧；有的作虎噬人形或鸱鸢形（图83）。盘高圈足，浅腹（图127、128）。乐器有三件或五件一套的小铙，已有了半音观点，为十二律奠定了基础；兽面纹大铙（图142），通高66厘米，铣距48.5厘米，身饰粗线条兽面纹，为罕见的大型铙。戈主要有“直内”、“曲内”和“鋈内”几种形式，嵌红铜棘纹戈（图165），在援脊上镶嵌红铜勾棘形纹，商代独此一例。此外，还出现了有胡有穿戈，穿有三穿或四穿。矛体宽大，有镶玉刃的矛（图166），柄为青铜，矛头玉质，显然不是实用武器。钺方体，为仪仗用具，兽面纹大钺（图163），有梅花和小兽面图案，厚重中见精巧，威严中现精美。

器物纹饰丰富多彩，有主题花纹和衬托花纹，有些在主纹上再填花纹，形成三层纹饰，更显繁缛富丽。花纹内容仍以兽面纹和夔纹为主，三羊尊（图75），腹部饰兽面纹，双眼凸出，神秘怪诞，令人望而生畏。夔纹的形象多为一角，一足，张口，尾上卷（图4），常饰在器物的颈部或圈足上。还有一些写实的动物纹，如友尊（图77），器腹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九只象，形

象生动、优美；牛纹卣（图85），颈与盖沿饰牛头纹；还有鸟纹（图89）、蚕纹、蝉纹、

鱼纹、龟纹等。几何形图案主要有云雷纹、弦纹、圈带纹、乳钉纹、圆涡纹等，多作辅助纹饰。造型手法上采用平雕与圆雕相结合。铸造方法较之前代更为复杂，例如酈亚方尊（图76）、酈亚方罍（图78）、三羊尊等器肩上的

兽头、象头和羊头都是先单独铸成后，再嵌入器身的外范内与器体合铸，称为分铸法，说明此种方法在商后期已非常发达。还有些器物的棱角与中线处常饰有扉棱，以增强雄伟感，亦成为这时期青铜器装饰的特点。

商代后期铭文开始发展，一般较简短，一二字或十几字，少数铭文可达四五十

十字。内容有的标明器主的族氏，即族徽，如：“酈亚”、“宁”、“车”；有的

反映祭祀的祖、妣、父、母、兄等，如“祖辛”、“父戊”、“母辛”；有的反映上级对下级的赏赐，如六祀卣其卣铭文（图88）中的赏赐宝玉，小臣缶方鼎（图4）铭文天子对小臣缶赏赐禾稼，毓祖丁卣（图82）铭文中记有“锡厘”，即赏赐祭祀时的肉食；还有的反映征伐。因此，青铜器铭文对当时的家族史、祭祀制度、社会生活和古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都是极重要的资料。

礼乐制度完备的西周青铜器

西周建立了远比商代更加完备的政治制度和礼乐制度，作为这种制度集中体现的青铜礼乐器，也就成为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反映在器型种类、风格特点上，必然有一些新的发



展变化。西周青铜器长篇铭文较多，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远胜过文献史料，可与史料相互补证；一些铭文内容还可以反映出做器的明确时代和王世所属，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因此，铭文是衡量这时期青铜器价值的重要标准。

西周青铜器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从武王至穆王为西周前期，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中叶；共王至幽王为西周后期，年代相当于公元前10世纪中叶至公元前8世纪。

西周前期的青铜器主要继承商后期的形制，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庄严厚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风格，铜器数量远远超过商代。食器主要有鼎、簋、鬲、鬯。酒器有爵、角、斚、觚、觶、尊、鸟兽尊、卣、壶、方彝、兕觥、勺等。酒器虽然品种齐全，但数量比商代减少了，这与西周王朝吸取了商纣“酒池肉林”而致亡国的教训有关。水器主要有盘。陕西出土了三件一编的甬钟，是最早的编钟。悬钟的使用使音质更佳，音调更准确。青铜武器有周族特有的勾戟，剑始萌芽。组合酒器的器座——禁开始出现。此时产生了列鼎制度，反映了礼制的加强。用鼎的多少是随名位的不同而有区别的，鼎的形制、花纹相同，但尺寸据器主的等级依次递减，形成由大而小的序列，这就是“列鼎制度”（或称“升鼎制度”）。大量传世及出土的鼎，证实了这种制度的存在。

形制上，三足器如鼎、鬲的柱足与蹄足并存，双耳在口沿上（图15、16）。鼎腹有的很浅，典型作品如成王时的师旅鼎（图17）。康（王）、昭（王）时的鼎、簋、尊、卣、方彝之腹下垂。有的圆鼎，圆形底下面再置一盘，用以置炭加热，这种小巧玲珑的实用器是此时期的新发明（图14）。簋开始出现新的形式，如圈足下附方座，簋身附四耳（图29）等。鬲多有腹耳，如师趁鬲（图25）。一般认为青铜簋出现在西周中后期，本卷所收的一件夔纹大簋（图42），长方形体，四角呈圆形，饰典型的夔纹和辐射状直线纹，具有西周早期器的特点，是现存最早的一件青铜簋。

此外，制作规整、纹饰精美的鸟纹爵（图97），腹耳平盖鼎、高领鬲、四足盃、方形圆口或有鋳尊（图99），长身长颈贯耳壶（图107）、双耳盘等，形制上都有别于商后期的同种器物。戈援加宽，胡加长，有一穿至三穿（图168），还有四穿戈。

兽面纹和夔纹仍是主要纹饰题材，但有所变化和创新，如出现了卷体夔纹（图27）、兽头鸟身纹。双身龙纹在方形鼎的颈部表现得尤为突出。凤鸟纹常饰在铜器的重要部位，华丽醒目，如伯作簋（图30），腹部有两只相向的凤鸟纹饰；鸟纹爵上左右对称的长尾高冠的鸟纹；凤纹觶（图98）器身明显凸起的三道凤鸟纹，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巴蜀地区出土器有一首二身的牛



纹，风格奇特。几何纹也有一定的发展，水鼎(图15)、夔纹簋的直线纹简洁朴素。一些器物上饰有高大的扉棱，或平雕动物的某一局部翘出器表，宏伟奇美。

铜器的铭文较之商代有所发展，出现了上百字的长篇铭文，字体仍沿袭商后期的波磔体，内容主要有祭祀、策命、训诰、赏赐、征伐，其中训诰、策命等内容是商代未见的。

西周后期青铜器多轻薄简陋，制作质朴，纹饰亦趋向简单，但长篇铭文增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酒器中的爵、角、斚、觚、觯、方彝等基本消失，保留有壶、罍、盃、尊、鸟兽尊等器种。盛食器簋(图43)、盨(图46)，注水器匜，均为新出现的器种，实用性强。鸟兽尊更为发达，新出现了兔形尊。铜钟发展到四件、六件和八件为一肆。“列鼎而食”的列鼎制度尤为盛行。

器形上有新变化。鼎、鬲多蹄形足，典型的有大鼎(图19)、克鼎(图23)等；有些鼎在口沿一侧有流口，如龙纹有流鼎(图24)。簋除在圈足下加方座外，有的还附有三小足，如师酉簋(图31)、毳簋(图34)，有盖簋也增多了(图35)。鬲作折沿、折足，本卷所收的刑刑奴隶守门鬲(图26)，上部为容器，下部带火灶，两扇可开合的灶门，外铸圆雕刑刑俑人，形制极为特殊。簋侈口，斜下收腹，器与盖各有四矩形短足。盘腹有耳(图129)，出现了方形盘(图130)。壶长颈，有套环耳(图109)。戈援前锋呈等腰三角形。

纹饰上的变化也体现了时代特点，出现了一些新的纹饰，如刑刑奴隶守门鬲腹上的环带纹，格伯簋(图33)方座立面的窃曲纹，颂簋(图37)圈足上的鳞纹，鬲从盨(图45)颈部所饰的一周重环纹等。兽面纹一般不再做主题装饰，而仅饰在器足上。凤鸟纹继续流行，如追簋(图32)，通体饰回首垂冠的夔凤纹。圆雕装饰有所加强，如虎饰钟(图148)，在兽面纹中心部位铸一翘尾露牙、跃跃欲奔的圆雕虎，精美诡譎。有的器物素面或仅有几道弦纹，如颂鼎(图18)、大鼎，全器光素，仅在颈部饰两道弦纹；一些花纹粗犷潦草。这与此时期器物多注重铭文有关。

青铜器铭文对研究古代史、校正古籍以及研究古文字的形、音、义等方面均具有很高的价值。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宣王器毛公鼎，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是目前所见最长的青铜器铭文。本卷所收的西周后期重要的长铭青铜器，有颂鼎、大鼎、师酉簋、格伯簋、颂

簋、谏簋(图39)、扬簋(图40)、豆闭簋(图41)、克盃(图44)、鬲从盃等。这些铭文的内容涉及广泛,反映了青铜器为礼乐制度服务的突出作用。

首先,最多的是祭祀。《左传·成公十三年》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奴隶制国家的重大事情,西周青铜器铭文关于祭祀的反映最为突出,追簋、杜伯盃、虢叔旅钟(图145)、颂簋等,均是为纪念祖先而做的祭器。从铭文表面内容看,作器者祭祀祖先的目的是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祈福祈寿,实质上是通过祭祀先祖的形式来维系和巩固宗族的血缘关系。

第二,策命与赏赐。策命大多是天子对臣下的任命,其内容就是一份任命书。也有侯伯对下属的命赐。策命地点一般在宗庙、王宫或太室。策命后常赏赐物品,包括土地、山川以至奴隶等,如颂鼎、豆闭簋、师酉簋等器的铭文。策命铭文对策命制度、礼仪制度以及各种名物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可与文献相互印证并作补充。

第三,战争与征伐。西周国家对外战争与征伐的目的,金文中不少名篇都反映这一内容。如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征伐西北境内的强族獫狁。师旅鼎(图17)铭文记师旅众仆因不随从周王征战方国,而被上级白懋父罚币三百,反映了西周早期士兵反战的情况。这些记有战争内容的金文是我们研究西周后期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重要资料。

第四,反映土地制度的变化。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所有,他可以把土地以及耕种土地的奴隶赏赐给臣下和诸侯,让其世代享用,臣下与诸侯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并且要定期向周王交纳贡赋,周王也可以随时收回土地。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铜器的铭文也有贵族之间以物换取田地的记载,如共王时的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良马换取了棚生的三十田,双方订下了契约。西周中期以后出现了私人占有土地的现象,国有土地制度渐被破坏。但这一时期贵族在交换田地的过程中,形式上还要尊重王廷,向王朝大臣报告。私人占田现象的出现,是与西周中期以后政权走向衰落的形势紧密相关的,用金文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可以看出西周中后期土地制度演变的轨迹。

此外,西周后期铜器铭文的内容还有很多,例如买卖奴隶、划疆界及盟誓、反映刑法等方面的内容等。

后期铭文文字排列均匀整齐,字体严谨精到,书法娴熟,竖笔呈上下等粗的柱状,称“玉筋体”。大克鼎还采用了方格,格内填字。虢季子白盘的铭文读之朗朗上口,具有很浓的韵味,书体圆转秀美,开小篆字体之先河。

变革出新的春秋青铜器

春秋时代是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期，铁制工具在农业、手工业中的使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青铜铸造业上王室铸器减少，诸侯国则普遍铸器，不仅晋、楚、齐、鲁、吴、越、秦等大国铸器，而且纪、薛、费、黄、邓等小国也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业。在青铜器铸造上，透露出变革时代的气息，创造了不少崭新的内容。

青铜工艺进步的突出表现是分铸法的发展。出土于河南新郑的莲鹤方壶(图112)，形体巨大，器底与器身的虎、龙，盖顶展翅欲飞的仙鹤，均采用分铸法，取得了凝重活泼的艺术效果。这时期的青铜器还采用了失蜡铸造法，反映了青铜工艺的高度发展。在纹饰装饰上采用拍印模法，即用刻有花纹的陶或木质拍子，在范模上按印出连续成组的图案。此前青铜器纹饰需先在陶模上雕刻，工序繁琐，拍印法则省时、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时期最流行的细密的蟠虺纹一般都采用这一方法，四蛇方罍(图51)的甑上有勾连雷纹即用此法。青铜镶嵌工艺进一步发展，嵌红铜工艺有独特的魅力，如嵌红铜狩猎纹豆(图56)，图案镶嵌之精令人赞叹。

器类上，食器有鼎、鬲、甗、簋、簠。盛食器中的球形敦、带盖豆，酒器中的尊缶，盛水或盛冰的大鉴，水器中的盥缶、钫，乐器铎于、铎、句铎等等，都是这一时代极富特色的器物。青铜武器中的戈、矛、戟、剑数量很多，并常见附件铍和镞。

器物形制上，鼎多有盖，盖上有三兽钮或三环钮，足作外侈的蹄形(图49)，尤以楚式鼎最为典型。楚鼎中还出现了束腰平底、浅腹、三短蹄足、口沿二耳外侈之鼎，自名为“𩰫”。簋(图53)、壶、匱(图54)的盖常以莲瓣为饰。莲鹤方壶在盖的双层莲叶间还立一圆雕之鹤，堪称瑰宝。有的簋沿袭西周方座特点，腹侧有双龙耳。甗多呈方形，鬲、甑分体(图52)。簠口缩小了外侈的角度，簠足加高。豆腹加深，多有盖(图63、64)。新出现了似瓢的无足匜。盂虽仍存，但形体较西周为小，如浙江出土的伯骕盂(图57)。甬钟、钮钟、搏钟并存，已发展到十几件一套。戈、矛分铸，戟加多。戈援上扬，三穿、四穿习见(图171)。有的戈内部呈透雕的鸟兽状(图169、170)。矛体向细长发展，加强了刺杀力。

如西周后期之粗犷简单的花纹此时已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工整细密的网状蟠虺纹。虺纹实际上是许多小蛇相互缠绕而构成的图案(图113)，这种图案的流行与拍印法的使用密切相关。吴越地区铜器常饰锥刺纹，也有蟠蛇装饰。楚地铜器常饰鼓凸呈粟粒状的变形蟠虺纹，其形有若飞溅的浪花。春秋晚期线刻画像开始萌芽，江苏六合程桥发现了几片有线刻画像的残铜



片，刻有野兽、树木、人物，线条简单，生动古朴。人事活动图案的出现对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及社会礼俗等都有重要的价值。

社会变革对铭文内容及书法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代青铜器铭文不如西周丰富，上百字的长篇很少见，齐叔夷钟一组铭文共四百九十二字，已属罕见。铭文内容多祭祀，也有为自己或他人作器的。由于礼制衰落，以铜器作女儿陪嫁的媵器数量较多，如陈子匱(图136)铭。同时用青铜制作的“弄”(玩)器也开始多起来。

由于诸侯国林立，金文书体也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字体有瘦体，有肥体，还有的刻意仿商周波磔体，在求工的基础上加强了字体的变化和装饰性。晋国还出现了颇具奇趣的蝌蚪文，如少虞剑(图173)铭文。江淮一带的剑、戈、矛等武器常装饰曲绕回旋的鸟虫书，可算是当时的一种美术字，极具装饰色彩。

地域特点鲜明的战国青铜器

战国时代，铁工具在青铜铸造业中使用，为青铜器注入了新的活力。生活用器增多。常见的器种主要有鼎、豆、壶、盘、匱、缶。轻便实用的铜器主要有球形敦、圆腹盃(图126)。湖北随县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形体不大、体作卵形的细长足敦。编钟尤为发达，著名者有曾侯乙编钟，本卷收有一套九枚的蟠螭纹编钟(图159)。鸟兽尊仍存，以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的犀牛尊最佳。青铜武器变化很大，这与战争形式从车战变为以骑兵和步兵为主有密切关系。戈、矛与分体戟盛行。

战国早期，青铜器的形制仍沿袭春秋晚期的一些特点，中、晚期变化较大。鼎足普遍低矮(图59、60)，盖上常有三牺、三环或三鸟钮。簠足变高，口不再外侈，上下常有子母卡口，器变深(图62)。甗下部的鬲仅有三短足，开始向秦汉时的釜演变。球形敦仍存。豆普遍作长校(图64)，尤以北方燕国豆最为典型(图63)。壶有圆、方(图120)、扁(图124)和圆形带流的(图121)，也有高足、匏形(图122)、鱼形(图123)和鹰首形的。盃作圆腹、有流，有鋈和提梁。戈援与矛体细长，戈援上扬，三穿与四穿戈习见(图176、177)，有的内末有斜刃。分体戟增多，曾侯乙墓有三戈一矛的同秘戟，是一种新式武器。用作矛、戈秘饰物的铸、镞数量很多，如大良造鞅镞(图183)、错银马足铸(图185)。青铜剑数量多，大多格、首俱全，有的茎上缠有“緺”(丝线)，其中尤以吴越地区出土的最佳，一些剑上还有错金银或嵌松石等装饰(图180)。无格、无首、扁茎似剑的铍此时出现(图181、182)。调兵遣将的符多作虎形，也有鹰形的(图187)。



这时期铜器纹饰内容丰富，壶、豆、鉴、匜等器上常刻有大幅的平雕画像，嵌红铜宴乐渔猎攻战纹壶(图118)，为宴乐、采桑、渔猎、攻战纹，是为贵族的礼仪活动，对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战争、礼俗、建筑等状况有极高的价值。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铜壶纹饰与此壶

内容相同。这一时期还流行绳纹、贝纹、三角云纹、勾连雷纹、羽状纹、花朵纹、龙纹(图114)、粟粒纹、蟠螭纹(图139)，长江流域的铜器多流行锥刺纹、龙凤纹等。也有一些素面器，楚王禽志盘(图141)、铸客豆等。

由于金属细工的发展，铜器装饰出现了不少新技法，如错金银、镶嵌、失蜡铸造法等等，使得这时期的一些青铜器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铜器铭文简约，多为刻铭，多记载容量(斗、升)或重量(斤、两)，反映了当时商业经济和度量衡的发展。剑、戈、矛之铭文常标明是由国家控制的武器作坊或某地铸造的，燕国兵器常有燕王某之题名，如十六年喜令戟(图178)；秦国武器常标明上郡铸造地和相邦督造铭；楚国兵器铭常有国君名(图175)。此外，还有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凭证符，反映了王权集中、调动军队必用兵符的情况。通行凭节，规定有水陆通行路线和车船数目，是研究当时商业、交通和节制制度的重要资料。

战国时期，列国在文化上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铭文的字体、写法上有差异，异体字常有出现。秦国和其他六国形成了不同的文字体系，即所谓“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南方不少地区仍延续春秋以来的鸟虫书字体，如楚王禽璋戈铭就是典型的鸟篆书体。

战国时的青铜器以其铸造精良、金属细工高超以及轻便实用见长，开创了青铜器铸造业的一代新风。

注释：

- (1) 《登封王成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
- (2) 司母戊鼎 1939年出土，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